

DOI: 10.19361/j.er.2024.06.03

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与劳动生产率提升

刘一鸣 曹廷求 王艺明*

摘要: 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在兼顾经济效率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平衡方面,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日益受到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公众的关注。本文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等机制可以在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与劳动生产率提升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中的G-组织机构在小型企业分组中更为显著,S-慈善捐赠在资本密集型分组中更为显著;采用工具变量处理了潜在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将为探究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机制提供新思路,为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F276.5

一、引言

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重视与关注(毛其淋、王玥清,2023)。ESG体现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宋科等,2022;谢红军、吕雪,2022),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注重技术创新、坚持绿色环保、改善治理结构可以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助力企业发展。以环境、社会和治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ESG表现,对于民营企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① 其一,以污染防

*刘一鸣,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院,山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liuyiming@sdu.edu.cn;曹廷求,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济南)产业金融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tqcao@126.com;王艺明(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wym@xmu.edu.cn。

本文受到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供应链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研究”(ZR2024QG004)、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数字供应链金融赋能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2023RW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方金融运行动态监测及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19ZDA091)项目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与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本文的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为作者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中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相关问卷问题整理得到的新指标,主要是指将环境、社会与治理因素纳入企业日常经营与投资决策的理念,一方面民营企业可以用来规范自身表现,另一方面投资者可以据此衡量和评价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等。

治为导向的企业环境战略,使得民营企业在缴纳环保治污费的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环保绩效,进一步促进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民营企业进行绿色环保生产可以获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大大促进了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其次,除了台风、地震、疫情等重大灾害的慈善捐赠外,很多民营企业还积极参与“光彩事业”等。企业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万攀兵,2020),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王艺明、刘一鸣,2018)。民营企业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既可以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公平,还可通过一定程度的广告宣传树立企业品牌形象,为企业带来声誉价值,提升企业绩效,获评优质征信评级,表现出ESG缓解融资困境的“利他动机”。其三,民营企业良好的组织机构设置代表着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对于整个企业内部管理运营及风险控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的正式制度,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分管不同的领域,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提供战略决策和最优发展方案。综上,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纳入投资决策,不论是生产方式的选择还是技术层面的革新,都会大大提升企业的品牌声誉、行业竞争力等,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积极影响,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选择(段婷婷、张立光,2024)。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向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方向转变(陈邑早、岳新茹,2023)。民营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生力军。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民营企业注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品牌效应树立企业形象,得到更多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资金资源支持、税收优惠减免和研发创新项目,构成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战略要素(Ghoul et al., 2017),而这些都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营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能否通过追加投资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进而实现价值增殖?其作用机制如何?已有研究对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尚缺乏较为深入的探讨。

本文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选取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和劳动生产率指标,探究其关系及影响机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学术界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评价体系,本文选取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中调查问卷问题涉及的环保治污、慈善公益事业、组织机构设置等角度,以度量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并且通过熵权法构造了民营企业ESG表现综合得分指标,以探究民营企业通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渠道机制,丰富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其次,不同于现有研究(刘一鸣、王艺明,2021;2022),经本文进一步完善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是可以用来衡量企业发展情况的指标之一;最后,本文采用各地区环境监测站数量、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数额及社会组织单位数量等分别作为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工具变量,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确保所得结论的稳健性。

二、理论假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路径(刘志彪,2015)。生产要素是劳动生产率的原生动力,企业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如加强员工培训、开发新技术、升级设备、加强管理、建立渠道、培育品牌等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和价值。此外,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成本是企业生产要素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增长时,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投资意愿减弱,进一步表现为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增收困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助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包括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工资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民生改善的重要体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否与劳动报酬的提高速度保持同步和适应是保障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关键。工资总额与利润总额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协同增长,这种劳资双赢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高岭等,2022)。

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不仅包含对股东负责、善待员工等公司内部基本面,还包含对消费者负责、服从政府领导、维护与社区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慈善捐助、热心公益事业等多个方面。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对于企业自身发展也有很大帮助,有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顾雷雷等,2020)、获得研发创新项目(方先明、胡丁,2023)、提升经营绩效(李百兴等,2018)、帮助企业规避风险(Lins et al.,2017;Albuquerque et al.,2019)等。从企业良好 ESG 表现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在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要积极履行对消费者、环境、员工等的社会责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阳镇等,2021)。

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可以看作一种稀缺的无形资产投资,有助于带动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影响机制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有助于树立积极的企业形象,产生品牌效应,提高企业营业收入和企业绩效(“做大蛋糕”)、改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分好蛋糕”)(聂辉华等,2022),而这些方面都是决定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其次,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企业负面信息的宽容态度,缓和企业经营危机,帮助企业规避风险(Lins et al.,2017),企业良好的风险治理能力也是企业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三,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存在声誉机制,可以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信用考评的重要方面,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李增福、冯柳华,2022),有助于企业运营过程中良性的资金周转和顺畅的生产周期,进而大大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第四,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可以为企业的资金资源支持、税收优惠减免、有利商机项目及研发创新项目等,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风险、促进绿色创新,进而增强盈余持续性(席龙胜、赵辉,2022),进一步带来企业税收、净利润和员工工资等各方面的积极增长,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最后,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文化,调动了员工的创新创造活力和生产积极性,维护了职工的各方面权益保障,进而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还能吸引更多高质量劳动者加入企业,使得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工人工作使命感大大提升(颜爱民等,2022)。因此,本文将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完善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和劳动生产率指标,实证检验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提升劳动生产率、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民营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

假说2:民营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可以通过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缓解融资约束、赢得商业机会及研发创新项目等机制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选取的数据样本期间是第五次至第十三次调查数据。同时,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国及全球经济数据库(CEIC)等数据库相匹配。各数据库相匹配后,进行如下数据处理:剔除雇佣员工数少于8人的企业、剔除金融类企业及已上市企业、剔除登记企业家年龄不满18岁的企业,并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的样本观测值为12555个。

(二)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拟采取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value = \beta_0 + \beta_1 ESG + \beta_q \sum_{q=2}^m X_{Controls}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sum province + \varepsilon \quad (1)$$

(1)式中:核心被解释变量 $value$ 代表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 ESG 表现,具体将采用企业 E-环保治污(及 E-污染治理)、S-慈善捐赠(及 S-“光彩事业”)、G-组织机构(及 G-员工培训)等方面进行验证,综合探究民营企业 ESG 表现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X_{Controls}$ 代表各类控制变量, $industry$ 、 $year$ 和 $province$ 代表被调查企业所属行业、调查年份和所属省份的固定效应。 β_0 为常数项, β_1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β_q 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ε 为扰动项。样本数据为混合横截面数据,回归过程主要采用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根据刘一鸣和王艺明(2021,2022)构建、完善,即企业每个员工创造的新价值^①。在回归过程中我们采用按1978年不变价格将其进行转换后的实际值^②,并进行标准对数化处理。核心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 ESG 表现^③,主要采用企业缴纳的环保治污费(及污染治理投入)、慈善捐赠额(及是否参与“光彩事业”)、组织机构设置(及交纳员工培训费)等方面指标进行了多角度综合度量。同时,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企业家层面及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最后,控制了调查企业所属行业、调查年份和所属省份等固定效应。

具体各变量说明见表1。

①受限于篇幅,本部分指标构建理论基础部分内容备索。

②具体计算方式为:实际值=原始名义值/GDP平减指数 $\times 100$,其中GDP平减指数按1978年为100计算。但考虑到后文实证结果中的系数量级,在实际回归中文章采用的计算方法为实际值=原始名义值/GDP平减指数 $\times 1000$ 。后文同。

③由于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受限于变量可得性,无法构造如上市公司 ESG 评级的多变量综合指标,但本调查数据主要针对规模较小、无公开财务数据的民营企业,据此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获得更为重要的、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助力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 = $\ln[(\text{税收} + \text{税后净利润} + \text{工资}) / \text{员工数} + 1]$
解释变量	企业 ESG 表现	E: $\ln(\text{企业人均环保治污费或污染治理投入} + 1)$ S: $\ln(\text{企业人均慈善捐赠额} + 1)$ 或是否参加“光彩事业” G: 是否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党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或 $\ln(\text{企业人均员工培训费} + 1)$ 采用熵权法构造的以上六个指标合一的民营企业 ESG 表现综合得分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资产 企业成立年限 企业类型	$\ln(\text{企业雇佣员工数} + 1)$ $\ln(\text{企业人均资产} + 1)$ 调查年份 - 创办年份 1 = 独资, 2 = 合伙, 3 = 有限责任公司, 4 =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家层面控制变量	企业家政治身份 企业家年龄 企业家性别 企业家学历 企业家收入	企业家是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在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任职 调查年份 - 出生年份 1 = 男性, 0 = 女性 1 = 小学及以下, 2 = 初中, 3 = 高中, 4 = 大专及本科, 5 = 研究生 $\ln(\text{企业家的个人年收入} + 1)$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市场化程度 金融市场化程度 政府与市场关系 合法权益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 人均 GDP 金融发展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数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各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程度指数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各地区合法权益保护程度指数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指数 $\ln(\text{各地区人均 GDP} + 1)$ 各地区年末银行贷款额/GDP
固定效应	企业行业 调查年份 所属省份	行业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注:表中变量税收、税后净利润、工资、环保治污费、污染治理投入、慈善捐赠额、员工培训费、企业资产、企业家的个人年收入、年末银行贷款额、GDP 等变量的单位均为万元,人均 GDP 单位为元。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首先,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值为 0.2862,标准差为 0.3132,且最小值为-0.0397,最大值为 1.8632,表明不同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关键解释变量民营企业 ESG 表现的相关变量指标表明:从企业 E-环保治污情况来看,均值为 0.5160,企业 E-污染治理的均值为 0.6767,从以上统计结果可见,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有较强的自发和主动意识,且投入了较多资金进行环境治理。企业 S-慈善捐赠的均值为 0.1044,标准差为 0.1568,最小值、最大值的区间为 [0.0016, 1.0090],有 62.97%的企业参与过 S-“光彩事业”,可见不同企业在履行慈善公益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从 G-组织机构设置情况来看,企业平均至少会设置 2 项组织机构,标准差 1.7390,值域 [0, 6] 代表的企业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在不同企业间呈现出较大差异。企业 G-员工培训的均值为 0.0982,最大值为 0.6646,表明企业在员工素质提升方面的差异化投入。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到的民营企业 ESG 表现综合得分均值为 0.1292,标准差为 0.1228,最小值 0,最大值 0.8834,呈现出较大的样本差异性。总的来说,样本民营企业在 ESG 表现方面整体态度较为积极,参与程度和力度都比较大。

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企业规模平均值为 4.2050,成立年限平均 9.3992 年,企业资产平均值为 2.2089,可见被调查企业基本具备一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历史。从企业家的个人特征来看,企业家年龄平均为 45.6971 岁,85.87%的企业家为男性,55.21%的企业家拥有政治身份,58.92%的企业家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各项宏观经济制度环境指标表明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最大值
企业劳动生产率	0.2862	0.3132	-0.0397	0.1106	0.1927	0.3357	1.8632
E-环保治污	0.5160	0.9410	0	0	0	0.6931	4.3944
S-慈善捐赠	0.1044	0.1568	0.0016	0.0227	0.0541	0.1133	1.0090
G-组织机构	2.6659	1.7390	0	1	2	4	6
E-污染治理	0.6767	1.3855	0	0	0	0.5878	6.2166
S-“光彩事业”	0.6297	0.4829	0	0	1	1	1
G-员工培训	0.0982	0.1130	0	0.0285	0.0632	0.1178	0.6646
ESG表现综合得分	0.1292	0.1228	0	0.0400	0.0786	0.02398	0.8834
企业规模	4.2050	1.3405	2.1972	3.0445	4.0775	5.0814	7.8586
企业资产	2.2089	1.3735	0.0032	1.1816	2.1258	3.1499	5.8123
企业成立年限	9.3992	5.4977	1	5	9	13	25
企业类型	2.6962	0.8468	1	3	3	3	4
企业家政治身份	0.5521	0.4973	0	0	1	1	1
企业家年龄	45.6971	8.3640	26	40	46	51	66
企业家性别	0.8587	0.3484	0	1	1	1	1
企业家学历	3.4924	0.8590	1	3	4	4	5
企业家收入	2.4764	1.0974	0	1.7918	2.3979	3.0445	6.2166
市场化程度	8.3792	2.3023	-0.3	6.92	8.31	10	13.49
金融市场化程度	10.6662	3.9619	-13.71	7.69	10.31	12.92	20.96
政府与市场关系	7.8593	1.8235	-8.73	6.61	8.17	9.13	10.65
合法权益保护	5.6163	2.3228	-1.91	4.02	5.68	6.99	13.79
知识产权保护	11.6742	12.2244	-0.41	2.74	6.32	17.61	53.51
人均GDP	10.4493	0.7519	8.3482	10.0160	10.5663	11.0356	11.6442
金融发展	0.0118	0.0061	0.0007	0.0070	0.0105	0.0157	0.0357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1,本文首先检验了民营企业ESG表现中缴纳的环保治污费代表的环境E对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回归采用了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OLS模型,表3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逐步加入各项控制变量后,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缴纳的环保治污费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均保持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较为稳健,表明企业积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通过积极主动缴纳环保治污费进行生态环境保护,高度贴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同时有助于树立积极的企业形象、产生品牌效应,提升企业在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的信用评级,为企业提供资金资源支持、税收优惠减免、有利商机项目及研发创新项目等,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一步,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企业资产和成立年限、企业家政治身份和收入、地区人均GDP水平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这些结果均是符合现实预期的。^①

^①受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报告企业类型、企业家学历等类别变量回归结果,但在回归过程第(2)~(4)列中已逐步控制,进一步证实了民营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表 3 企业 E-环保治污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1)	(2)	(3)	(4)
E-环保治污	1.9245 *** (0.1622)	1.8198 *** (0.1252)	1.7021 *** (0.1299)	1.6322 *** (0.1344)
企业规模		0.0258 *** (0.0092)	-0.0150 (0.0096)	-0.0134 (0.0093)
企业资产		0.2235 *** (0.0084)	0.2049 *** (0.0084)	0.2071 *** (0.0085)
企业成立年限		0.0295 *** (0.0057)	0.0305 *** (0.0057)	0.0290 *** (0.0057)
企业成立年限 ²		-0.0011 *** (0.0002)	-0.0011 *** (0.0002)	-0.0011 *** (0.0002)
企业家政治身份			0.0508 *** (0.0144)	0.0583 *** (0.0153)
企业家年龄			0.0000 (0.0007)	-0.0001 (0.0007)
企业家收入			0.1487 *** (0.0111)	0.1469 *** (0.0111)
企业家性别			0.0071 (0.0157)	0.0095 (0.0159)
人均 GDP				0.1109 *** (0.0165)
金融发展				-3.3626 ** (1.5119)
市场化程度				-0.0181 (0.0169)
金融市场化程度				0.0037 (0.0040)
政府与市场关系				0.0179 (0.0253)
合法权益保护				-0.0140 (0.0084)
知识产权保护				-0.0001 (0.0010)
常数项	1.1844 *** (0.0219)	0.4168 *** (0.0557)	0.4056 *** (0.0766)	-0.5790 * (0.2946)
观测值	15 293	11 201	10 192	9 802
拟合度 R ²	0.0252	0.2935	0.3285	0.3302

注:回归采用了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中为标准误。第(2)一(4)列均控制了省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接下来,我们针对民营企业 ESG 表现中慈善捐赠额代表的社会 S 对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验证,回归同样采用了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 OLS 模型,表 4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逐步加入各项控制变量后,企业慈善捐赠额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均保持在 1% 水平上显著,且结果较为稳健,表明企业积极进行慈善捐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现有文献的慈善捐赠积极效果结论相一致。

最后,我们选取民营企业组织机构设置情况代表民营企业 ESG 表现中的公司治理 G 验证其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同样采用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 OLS 模型,表 5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逐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后,民营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结果较为稳健,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设置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党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完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及整体运行机制,进而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这一结果也是符合预期的。

表 4 企业 S-慈善捐赠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1)	(2)	(3)	(4)
S-慈善捐赠	1.5714*** (0.1215)	1.0888*** (0.0668)	0.9762*** (0.0681)	0.9366*** (0.0661)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家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601*** (0.0194)	0.9801*** (0.0954)	0.9751*** (0.1096)	0.1138 (0.2411)
观测值	20 165	14 519	13 216	12 084
拟合度 R ²	0.1030	0.3034	0.3296	0.2972

注:回归采用了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回归中均控制了省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的选取方式同表 3。

表 5 企业 G-组织机构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1)	(2)	(3)	(4)
G-组织机构	0.0775*** (0.0057)	0.0738*** (0.0126)	0.0774*** (0.0127)	0.0739*** (0.0131)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家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881*** (0.0276)	1.1607*** (0.0902)	1.2004*** (0.1103)	0.5934* (0.3073)
观测值	21 943	15 344	13 814	12 555
拟合度 R ²	0.0307	0.2962	0.3308	0.2960

注:同表 4。

表 3—表 5 的结果表明,采用企业缴纳环保治污费、慈善捐赠额及组织机构设置等多方面度量的民营企业 ESG 表现对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前文提出的假说 1 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 稳健性检验^①

1. 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文章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均采用了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的 OLS 模型。首先,重新选取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作为企业 ESG 表现中环境 E 的代理变量,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也能较好地度量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回归结果显示,通过逐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企业污染治理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积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企业整体生产经营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①受限于篇幅,本部分回归结果备索。

其次,以企业是否参与“光彩事业”这一慈善公益行为作为企业 ESG 表现中社会 S 的代理变量。“光彩事业”既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充满感情的道德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最后,以企业支付的员工培训费作为企业 ESG 表现中公司治理 G 的代理变量。企业交纳员工培训费越多表明企业越重视培养员工的专业技能和整体素养,而企业员工作为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直接内生力军,其技能和素养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支付员工培训费的增加将带来企业劳动生产率在 1%水平上显著提升。

2. 综合分析

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完整性,本文将以上民营企业 ESG 表现的三类变量进行综合回归分析,采用聚类标准误的 OLS 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与前文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逐步控制企业缴纳环保治污费、进行慈善捐赠和组织机构设置等 ESG 表现的影响,企业良好的 ESG 表现均在 1%水平上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组内系数差异 *test* 检验的结果报告的 Chi^2 值为 252.19,且 p 值为 0.0000,表明各变量之间的显著结果不受其他几类变量的影响,结果较为稳健。

此外,为了更加显著地体现民营企业 ESG 表现对其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整体积极效果,我们将前文提出的民营企业 ESG 表现的六个指标:E-环保治污、E-污染治理、S-慈善捐赠、S-“光彩事业”、G-组织机构及 G-员工培训等采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测算,构建了民营企业 ESG 表现综合得分指标。回归结果表明,采用熵权法构建的民营企业 ESG 表现综合得分指标仍然在 1%水平上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综合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前文提出的假说 1 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三) 异质性检验

1. 分规模检验

我们认为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大型企业具备设备、技术及人员等综合优势,但可能生产积极性较低,而小型企业尽管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但受限于融资约束可能较难获得资源资金用于生产。此处我们参考方先明和胡丁(2023)的做法,将企业规模最小的 30%民营企业定义为小型企业,最大的 30%民营企业定义为大型企业。表 6 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在民营企业 E-环保治污、S-慈善捐赠两方面表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未发现显著的异质性,在 G-组织机构方面存在 5%水平的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对比各分组的显著性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均在小型企业中相对更为显著。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和整体机制相对较弱,更加积极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可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存在一定的“追赶效应”。已有文献也表明企业 ESG 表现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绩效等效果在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中都存在且显著(方先明、胡丁,2023)。

2. 分行业检验

本文借鉴刘一鸣和王艺明(2021)文中的行业属性标准,将民营企业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考察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异化效果,同样针对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表现进行验证。表7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均促进了各行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当我们仔细对比不同行业分组显著性水平时可以发现,S-慈善捐赠在分组检验中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E-环保治污虽未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但也表现为资本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由于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主要为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科研技术业等,且多为重污染行业,因此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积极的S-慈善捐赠更加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G-组织机构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和批发零售业等,从要素密集程度来说可能由于劳动力相对密集,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情况更复杂、人员管理相对繁琐,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带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表6 异质性检验 I : 分规模

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1)	(2)	(3)	(4)	(5)	(6)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E-环保治污	1.7496*** (0.2781)	1.2549*** (0.2872)				
S-慈善捐赠			0.9815*** (0.0977)	0.9695*** (0.1111)		
G-组织机构					0.0780*** (0.0138)	0.0483*** (0.00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3512 (0.4722)	-0.6758 (0.4329)	0.7580 (0.4712)	-0.4418 (0.3372)	1.4567*** (0.5147)	-0.3109 (0.3717)
组间系数检验 Chi2	1.83 ($p=0.1762$)		0.01 ($p=0.9350$)		5.41** ($p=0.02$)	
观测值	2 748	3 181	3 342	3 940	3 263	4 260
拟合度 R^2	0.3379	0.3135	0.3969	0.3142	0.3877	0.2900

注:同表4。

表7 异质性检验 II : 分行业

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1)	(2)	(3)	(4)	(5)	(6)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E-环保治污	1.4743*** (0.3235)	1.7581*** (0.1653)				
S-慈善捐赠			0.7436*** (0.1066)	1.1686*** (0.0860)		
G-组织机构					0.0732*** (0.0179)	0.0693*** (0.01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814 (0.4092)	-0.9821*** (0.3212)	0.6715* (0.3809)	-0.0445 (0.2203)	1.2707*** (0.3960)	0.2907 (0.3359)
组间系数检验 Chi2	0.75 ($p=0.3869$)		13.43*** ($p=0.0002$)		0.19 ($p=0.6652$)	
观测值	3 504	6 179	4 259	7 539	4 312	7 943
拟合度 R^2	0.3055	0.3275	0.2794	0.3024	0.2951	0.2825

注:同表4。

综合异质性检验的实证结果来看,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密集度行业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均是显著的,表明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特别地,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中的G-组织机构在小型企业分组中更为显著,S-慈善捐赠在资本密集型分组中更为显著。

五、进一步讨论

(一)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分别通过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创新等机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带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部分的机制分析结果见表8。

表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企业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	企业劳动生产率	企业SA指数	企业劳动生产率	企业研发创新	企业劳动生产率
E-环保治污	0.1578*** (0.0485)	1.2325*** (0.2180)				
企业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		0.3511*** (0.1070)				
S-慈善捐赠			-0.0670*** (0.0103)	0.9464*** (0.0671)		
企业SA指数				0.1412* (0.0772)		
G-组织机构					0.0289*** (0.0044)	0.0759*** (0.0155)
企业研发创新						0.1873*** (0.03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909** (0.0326)	-1.0354** (0.3937)	0.8515*** (0.0282)	-0.0064 (0.2602)	-0.0511 (0.2649)	0.5218* (0.2774)
观测值	1 929	1 821	12 705	12 084	10 283	9 749
拟合度R ²	0.1614	0.3381	0.9751	0.2974	0.1575	0.3234

注:同表4。

首先,企业在E-环保治污方面的积极表现,代表了企业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态度,一方面企业完成了应尽的生态环保义务,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品牌和声誉效应,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进而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优惠(0.1578***),大大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表8第(1)—(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缴纳环保治污费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获得的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优惠力度,进一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且这一中介效应结果在扣除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带来的提升作用后(0.3511***)仍在1%水平上显著(1.2325***),即存在显著的获得政策补贴

或税收减免政策优惠中介作用。

其次,表8第(3)—(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当企业积极进行S-慈善捐赠时,不仅可以通
过这种乐善好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提升公信力,产生声誉品牌效应,而且可以据
此获得更多的资源资金,还可以与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保持可持续关
系进而加大企业信息获取能力(Yuan et al., 202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670^{***})^①。而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代表企业有更多资源资金用于企业的生产经
营、技术设备升级,进而有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0.9464^{***}),存在显著的缓解融
资约束中介作用。

最后,企业为了更长期的生存发展,技术创新是突破外在竞争压力的重要手段(刘一鸣、
王艺明, 2018),而技术创新也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手段。对于
一个组织机构设置较为完善的企业来说,人员配备、部门设置均较为齐全,有足够的资源资
金和商业机会充分开展研发创新活动(0.0289^{***}),而研发创新活动对于企业来说代表着其
核心竞争力、技术创造力的大幅度提升,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动力,从表8第(6)列
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扣除了研发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促进作用后(0.1873^{***}),民营企业
G-组织机构设置仍然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0.0759^{***}),存在显著的促进研发创
新中介作用。

综合来看,民营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大大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带动民营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民营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带来更丰
富的资源资金、缓解融资约束,赢得商业机会及研发创新项目等各种渠道和机制发挥部分中
介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说均得以较好验证,本
文所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二)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完整性,本文针对民营企业ESG三方面表现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进
行内生性检验,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存在内生解释
变量,故我们首先针对以企业E-环保治污、S-慈善捐赠、G-组织机构为民营企业ESG表现
代理变量的主回归分别进行Hausman检验。其原假设为“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得到
的Chi²值分别为2268.35^{***}、2360.75^{***}、-716.51,显著拒绝了原假设,且进一步DWH检验的p
值均小于0.005,即认为企业E-环保治污、S-慈善捐赠、G-组织机构为潜在内生解释变量,
需要处理本文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我们分别
选取各地区环境监测站数量^②、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数额^③及社会组织单位数量^④作为

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采用企业SA指数衡量,计算方式为: $SA = -0.737 \times \ln size + 0.043 \times \ln size^2 - 0.040 \times age$,
其中lnsize为本文表1中变量“企业规模”,age为本文表1中变量“企业成立年限”。

②取自《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2000年各地区环境保护系统
机构数之环境监测站数量。

③取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2000年各地区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数额。

④取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2008—2018年各地区社会组织单位数量。

民营企业 ESG 表现代理变量企业 E-环保治污、S-慈善捐赠、G-组织机构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9。

表 9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1)	(2)	(3)
	E-环保治污	S-慈善捐赠	G-组织机构
环境监测站数量	0.4362*** (0.1133)		
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数额		0.9389*** (0.1840)	
社会组织单位数量			0.9901* (0.5987)
常数项	-0.4800*** (0.1681)	-0.4458 (0.3851)	-0.0827 (0.3364)
拟合度 R^2	0.2063	0.3710	0.2874
F 统计量	64.32***	85.18***	157.84***
变量	第二阶段:企业劳动生产率		
E-环保治污	0.4900** (0.2245)		
S-慈善捐赠		0.6721*** (0.1836)	
G-组织机构			1.3110* (0.7908)
常数项	-0.4963*** (0.1623)	1.7090*** (0.3335)	-0.2932 (0.45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 048	11 285	10 216
Chi ²	1566.61***	1516.57***	216.80***

注:回归采用了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首先,环境监测站是政府部门权威机构,主要负责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水和废水”监测、“噪声”监测、“环境空气和废气”监测、“辐射”监测等报告。而这些报告是企业缴纳环保治污费的核心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各地区环境监测站的数量与企业 E-环保治污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0.4362***)。而每个地区各级别的环境监测站设立为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安排,并不受单个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且我们选择的是 2000 年各地区环境监测站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 9 第(1)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排除了潜在内生性干扰后,民营企业 E-环保治污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0.4900**)。

其次,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是指各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系统、慈善会等机构和组织接收的捐款和物资。主要是施赠者出于爱心,自愿无偿地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单位、某个群体或个人捐赠财产进行救助的活动。因此,一个地区的社会捐赠氛围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当地企业家“乐善好施”思想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民营企业家进行的不同性质或给予不同主体的捐赠,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0.9389***)。此外,一个地区的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包含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团体的多渠道捐赠,并不会受到单

个企业发展情况的影响,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7第(2)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排除了潜在内生性干扰后,民营企业S-慈善捐赠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0.6721^{***})。

最后,社会组织单位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情况体现了该地区组织机构的规范性和普及性,会引导当地企业设置完整的组织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因此,各地区社会组织单位的数量对于企业完善组织机构设置起着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和规范作用,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0.9901^{*})。此外,各地区的社会组织单位主要包含政党、政府、企业、商店、工厂、公司、学校等多种不同的组织单位,并不会受到单个微观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9第(3)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排除潜在内生性干扰后,民营企业G-组织机构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1.3110^{*})。

进一步,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我们进行了F检验及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检验,其中第(1)—(3)列F统计量均大于10,且p值均为0.0000;采用LIML检验的系数估计值与2SLS检验一致,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此可见,本文所选工具变量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外生性与相关性条件,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较为稳健,潜在内生性问题得到较好的处理。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有利于促进企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采用第五次至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对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在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过程中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检验。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采用熵权法构建的民营企业ESG表现综合得分指标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表明研究结果均是较为稳健、显著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通过获得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研发创新等渠道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中的G-组织机构在小型企业分组中更为显著,S-慈善捐赠在资本密集型分组中更为显著;最后,在采用各地区环境监测站数量、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数额及社会组织单位数量等分别作为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代理变量的工具变量处理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仍然得出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研究结论。

由此可见,企业通过积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参与慈善公益项目、完善组织结构设置等展示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民营企业长期发展来说无疑是一项有高回报率的举措。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民营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其发展往往受制于融资约束。要充分发挥其“惠民生、促发展、助实体、增质效”的作用,民营企业应提升劳动生产率,加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中的参与,优化组织结构,强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尤

其是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应在 ESG 表现上发挥“追赶效应”,以此提升生产效率并营造公平营商环境。同时,构建产业链联盟和推动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治理能力、抗风险能力,并缓解融资难题,为其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第二,为推动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加快建立 ESG 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披露质量,使 ESG 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强化 ESG 信息披露,不仅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还能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政府关系。数字化转型为提升 ESG 数据的准确性和动态披露提供了支撑,有利于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相关部门应充分结合数字信息技术手段,完善 ESG 评级标准和激励政策,推动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实践,从而增强其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竞争力。

第三,政府部门应加大对 ESG 优势突出民营企业的支持,通过完善法律和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多资金、资源及专业人才,助力其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企业的政策支持可包括税收减免、金融信贷放宽等措施,以激励其在环保投资和创新发展上更积极投入。通过优化外部营商环境和建立稳定的支持体系,政府能够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其在新发展格局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最终为经济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陈邑早、岳新茹,2023:《数字技术何以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经济评论》第4期。
- 2.段婷婷、张立光,2024:《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 ESG 信息披露——基于 A 股纳入 MSCI 指数自然实验》,《经济评论》第1期。
- 3.方先明、胡丁,2023:《企业 ESG 表现与创新——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第2期。
- 4.高岭、唐昱茵、胡天祺、邵岩,2022:《回到马克思的生产视角: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比较分析》,《经济评论》第5期。
- 5.顾雷雷、郭建鸾、王鸿宇,2020:《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金融研究》第2期。
- 6.李百兴、王博、卿小权,2018:《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媒体监督与财务绩效研究——基于 A 股重污染行业的经验数据》,《会计研究》第7期。
- 7.李增福、冯柳华,2022:《企业 ESG 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财经研究》第12期。
- 8.刘一鸣、王艺明,2018:《私营企业家的时间配置与企业研发创新》,《财贸经济》第10期。
- 9.刘一鸣、王艺明,2021:《劳动力质量与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世界经济》第1期。
- 10.刘一鸣、王艺明,2022:《民营企业党建与劳动生产率:一个政治经济分析》,《经济科学》第6期。
- 11.刘志彪,2015:《提升生产率: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与关键措施》,《审计与经济研究》第4期。
- 12.毛其淋、王玥清,2023:《ESG 的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第7期。
- 13.聂辉华、林佳妮、崔梦莹,2022:《ESG:企业促进共同富裕的可行之道》,《学习与探索》第11期。
- 14.宋科、徐蕾、李振、王芳,2022:《ESG 投资能够促进银行创造流动性吗?——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金融研究》第2期。
- 15.谢红军、吕雪,2022:《负责任的国际投资:ESG 与中国 OFDI》,《经济研究》第3期。
- 16.万攀兵,2020:《基层党组织制度的社会治理作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经济评论》第3期。
- 17.王艺明、刘一鸣,2018:《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融资行为》,《财政研究》第6期。
- 18.席龙胜、赵辉,2022:《企业 ESG 表现影响盈余持续性的作用机理和数据检验》,《管理评论》第9期。
- 19.颜爱民、齐丽雅、谢菊兰、龚紫,2022:《员工感知到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研究》,《管理

学报》第11期。

20. 阳镇、马光源、陈劲, 2021:《企业家综合地位、家族涉入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微观证据》,《经济学动态》第8期。
21. Albuquerque, R., Y. Koskinen, and C. D. Zhang, 2019.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Risk: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Management Science* 65 (10): 4451–4469.
22. Ghoul, S., O. Guedhami, and Y. Kim, 2017.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s, Firm Value, and the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5): 360–385.
23. Lins, K. V., H. Servaes, and A. Tamayo, 2017.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 (4): 1785–1824.
24. Yuan, X., Z. Li, J. Xu, and L. Shang, 2022. “ESG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Irregularities –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32, 129992.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Promo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iu Yiming^{1,2}, Cao Tingqiu^{1,3} and Wang Yiming⁴

(1: School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2: Privat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3: Industrial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4: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activity entity, enterprises need to balanc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is increasingly receiving attention from investors,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CPES), to explor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on labor productivity in private enterpris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labor productivity;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promotion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enjoying policy subsidies or tax reductions,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promoting R&D innovation, thereby exerting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group of small businesses, while S-charitable donations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apital intensive group; Finally, we us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ddress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and the results remained robus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exploring the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support for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G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abor Productivity

JEL Classification: J24, M11, G34

(责任编辑:彭爽)